

## “社会福音”与边地社会改良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

邓 杰

提 要：1939年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进行了16年，其中涉及有大量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播事业相关的内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开展这一事业，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部，设置了若干服务区，从教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康地区的妇女工作。与此同时，边部非常注重对边地妇女的传教授道，以促进基督教福音事业在边地的发展。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曾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及福音传播工作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边地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限定在1949年之前。

邓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四川文理学院讲师。

主题词：社会福音 妇女事工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边疆服务

1939年冬，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涉及有大量的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播事业相关的内容：一方面，一些有志边疆服务的妇女从事实际的边疆工作，联络边疆妇女，为促进民族团结、在战时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教育、卫生、生计等服务边胞的工作，与妇女工作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边地社会的发展。余牧人在《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一文中指出，边部的这一活动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sup>①</sup>。沈亚伦认为，1937年至1949年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坚忍”时期；文章认为边疆服务部在少数民族的服务工作是基督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值得纪念”，是一种在“艰难中产生的事工，实在是可宝贵的。”<sup>②</sup>《中华年鉴》甚而将它纳入三十年代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范畴，加以肯定<sup>③</sup>。

然而，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现有的学术研究却难以让人满意，对于边疆服务运

动中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更是基本没有学者研究。且一般研究者普遍认为，基督教关注城市，忽略乡村，即便后来意识到乡村的重要而参与“乡村建设”，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甚措意，其妇女工作尤其如此。其实，至少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变。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尤其是四川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采用白描叙事的方法，用事实证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工作，在社会福音思潮兴起之后，已经逐渐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承认。

### 一、边疆服务部的创建及妇女事工缘起

抗战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工作直接与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简称“边部”）的建立有关。边部是应抗战建国之需，中华基督教会号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团体，直属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创建于1939年冬，结束于1955年10月底。边部办事处除一段时间

在重庆和上海外，其余时间均设在成都<sup>④</sup>，主要在川西、西康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从事福音传播和社会服务工作。

边部《服务规程》明确规定服务工作除教育、卫生、生计、宗教等事业外，还应包括有“以促进妇婴健康，改良家庭生活为主要目的”的妇女事业<sup>⑤</sup>。因此，总部一直非常重视在边疆服务运动中开展妇女工作。1940年5月，在川西服务区开辟不久，即派女医师祈玉玺等人去川西区开办威州诊所<sup>⑥</sup>。这是理县境内“开设的第一家西药为主的医疗机构”<sup>⑦</sup>。

为造福边地妇女，边部特于1942年2月成立妇女工作促进会，拟定了详尽的促进会组织大纲。大纲强调，妇女工作促进会是边疆服务部附设团体，其一切工作与服务部密切联络进行。促进会以“基督服务精神，唤起国内外人士对于边疆妇女工作之注意，共同推进边疆妇女工作，培养、训练有志边疆服务之妇女从事实际工作，并联络边疆妇女，促进民族团结”为宗旨。大纲规定：凡对边疆妇女工作有志趣、赞成该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之介绍由该会执委会通过者，皆可为该会会员；促进会设名誉会长若干人，正副会长各一人，中英文书记各一人，会计一人，执行干事一人，分掌各项事务；为便于推进各项事工，还成立了事工委员会，设训练组、组织组、宣传组，各组委员会分别负责工作的推进。大纲规定全体委员会大会每年举行二次，执行委员会每月一次，必要时得由主席召集临时会。并计划在国内外各大城市设立分会<sup>⑧</sup>。

妇女工作促进会的成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公报》认为这是“边疆妇女的福音”。《田家半月报》以《边疆服务部组织边疆妇女促进会》为题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根据两年来在边地实际的服务经验，深感边地妇女工作之需要，于是该部主任张伯怀及区主任崔德润氏，特于目前邀请各教会机关和各教会大学的女界领袖们，商讨促进边疆妇女工作的办法，经过几次会商，一致决定先行成立边疆妇女工作促进会，以便唤起国内外人士对边疆妇女工作的注意，计划训练有志服务边地妇女的人才，并联络边疆妇女感情，加强民族团结精神。……全国女青年协会，四川女青年会，华西，齐鲁，金陵，金女大，华西神学，以及成都各公会都有代表参加，此外，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国际妇女会亦各有代表参

加。按该会会员俱系国内外有名的妇女事业专家。……这真是边地女同胞的好消息。”<sup>⑨</sup>

边疆妇女工作促进会自成立之后，即致力于推动边疆妇女工作，成绩卓著。1943年初，该会已“征得会员二百余人”，并积极“筹设边疆妇女工作实验区”<sup>⑩</sup>。

边部还在舆论上支持边疆服务运动的妇女事工。冯云仙在《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一文中指出，在抗战建国事业中，应特别强调“边疆妇女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不应该忽视，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作者认为，“边疆文化闭塞”，“一般妇女的文化水准大为低落”，由此国人“也就容易忽视了她们将来在建国事业中的重要力量”。为改变一般人的成见，作者在该文中列举了边疆妇女的许多优点，以证明她们是“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热情”，“不知道穷奢极欲的享受，也不爱慕繁华和虚荣”，“安心于平凡，勤俭，刻苦的生活”，“勇敢而耐劳”的优秀女性。作者最后强调：“无论就边疆或全国的建设事业着眼，边疆妇女的地位都很重要。”<sup>⑪</sup>此文原发表于《妇女月刊》第5卷第1期，边部刊物为“提醒全国妇女领袖们”对边疆妇女问题“及早予以重视”，特将此文转摘在《边疆服务》第15期，希望能引起“妇女界领袖，关心边疆妇女生活”<sup>⑫</sup>。

在边部的积极支持下，各服务区及服务处（所）从教育、卫生、生计、宗教等方面积极推动妇女事工，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妇女事业的发展。

## 二、边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工作述概

基督教传教重心开始从城市移向乡村，农村妇女逐渐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这一重要变化从边部所开展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工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边疆服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西北边远的少数民族和西康地区。无论川西区还是西康区，因山谷屏障，交通困难，除生活必需的茶盐针线等交易及军事上需与外界接触外，内地文化绝少进入。加之地势、气候、农业、种族等各种关系，其社会结构、经济情形均与外界不同，被视为“化外之邦”。鉴于这种情况，边疆服务部分别从教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工作，以期改善边地妇女的教育状况，促进边地妇婴健康，改良其家庭生活。

首先看教育方面。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在边部工作人员进入之前，不仅没有正规的近代新式学堂，就是传统的教育机构也十分罕见。于是，边部开展了学堂的创建工作，为边地少数民族实施教育。边部所办学校分三类：第一类为自办，第二类为与地方政府合作或受县府委托而创办，第三类为协助私人办理。学校除吸收当地适龄儿童入学以外，还专门为边地妇女开设有成人妇女班。妇女班所授教学内容除读书识字之外，也讲授一些关于农业及卫生的常识，这样可以使“学校教师与本部的卫生、农业工作人员密切联系起来，以便更有效的服务人民。”<sup>13</sup>

以川西区为例。川西区在羌族聚居区办有佳山寨小学，吴祖太任校长，其妻王湘杰任教员。该校学生包括西山寨、子达寨、佳山寨三寨的学生，“经常有学生三十名左右，十年如一日”，“在所有边民学校中成绩最佳”。除开办小学外，佳山寨还有“发达的”民众学校，设有男夜校及妇女识字班，让当地女性读书识字。女性“亦知读书”是佳山寨小学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sup>14</sup>。

立力寨小学也成立了妇女班。该寨“对小学教育及妇女成人教育，倡之甚力”，“力谋儿童教育之普及”。妇女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的普及对该村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川西区生计干事刘国土曾就川西十六区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写就了长篇研究报告。他发现，由于边部在立力寨大力倡导妇女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该村农业状况与川西区其他寨子明显不同<sup>15</sup>。

丹扎木沟的善廷小学是官淑贞为纪念其亡父而创办的。因自己力量不足，特约边部帮忙。官女士自兼校长，教员两位，全为妇女，由边部担任一位教员的薪俸，其余费用由官氏负责。该校学生进步很快，“初次见面学生不能讲一句国语……；再次见面不但能讲话且能读书；三次见面不但能读书且能写字。”后来学生“考试成绩有惊人表现，几为诸校之冠。自开办仅两年半之久，学生已有读六册者，可见进步之速。”<sup>16</sup>

边部在日尔觉寨建有中心小学，建校之初有学生 40 余人，除教育干事张宗南“长住该校负责外，尚有小学教师张春艳在校教授各种学科，地方领袖王学政甚为帮忙。”当地还建有一所民众夜校，有学生三十余人，其中“妇女夜班亦有十余人”<sup>17</sup>。妇女班的“教材”与男子班有所区别。男子班所教内容主要是“应用文”、“简

单算法”、“公文程序”等，而女子班的内容却是：（一）识字；（二）针线手工；（三）毛线编织；（四）简单之家庭卫生等<sup>18</sup>。

在西康区，为大力推进民众教育，边部也办有妇女班。西康区的小高山小学的开办工作由谭秉玺主持。小高山学校校舍简陋，“出入抬不起头来，雨则满屋漏，学校无围墙，无校门，牲畜鸡犬粪尿满地，凡此种种均急待设法改进。”谭氏除致力改善其办学条件之外，还“特别注意社会教育”，“对夷人的教育生活，决尽力改进”，在校内“成立妇女成人班”，从教育入手，改进边疆妇女的教育状况及生活习惯，受到西康区主任王禾章肯定，他在给边部的信中说：“小高山小学大大的有进步了！”<sup>19</sup>

在三一新村服务处，民众教育的内容亦丰富多彩且有针对女性的专门教育。除在各服务所“每月刊民众壁报”，藉以灌输边民“农业工艺，医药学科学智识，及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外”，服务处还“举办了冬令短期民众学校五所”。其中一所为妇女班，初开办时“学生十五人”，虽“校址距处中五华里。同工们每日必至深夜始返处，颇为辛苦”，但同工们亦乐在其中<sup>20</sup>。

在医疗卫生方面，边部也下了不少力气，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在边疆服务的民族地区，由于“妇女在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束缚下，养成糊涂的羞耻心理，甚至病痛至死仍不顾就医”<sup>21</sup>，加上少数民族的某些特殊习俗，信巫不信医，妇女的健康状况极为恶化。经边部同工多年的坚持和努力，这一状况有所改变。1946 年 7 月，杂谷脑“一再发生难产死命不幸事件”，经杂谷脑服务处人员检查，发现绝大多数类似事件是由于边地妇女缺乏妇婴卫生常识所致，于是决定开办“妇女卫生讲习班”，授以“普通妇婴卫生常识并指导产前产后应特别注意事项”<sup>22</sup>。在妇女卫生讲习班开办后，以西医为主的医疗诊治工作在边地开展起来，边地妇婴难产死亡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缓解。西康区的医疗保健卫生工作，除了儿童和妇女的例行健康检查外，“对于一般妇女更加以妇婴常识，及环境卫生的指导”<sup>23</sup>，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民不讲卫生的陋习。

在生计工作方面，总部积极支持川西区和西康区提高边地妇女生活技能。由于“边地地瘠民贫，全是靠天吃饭，遇到了水旱天灾，往往好几年不能恢复元气”，边部认为改善边胞生活，

“须积极的倡办生产事业”<sup>21</sup>。1943年，总部召集两区负责人召开事工检讨会。针对两区工作的困难，提出了一些重要决议案，其中包括帮助两区解决生计困难、训练边地妇女提高生计技能的措施。

在川西区，按照边部的决议，牧师耿笃斋为提高边地妇女的生计技能下了不少工夫并取得了较好成效。该区工作开始不久，总部即派耿笃斋前往布道。耿笃斋于1940年春到达威州，很快全身心投入服务工作。除布道外，针对“边民的手工粗笨，衣服粗劣”的现状，他“利用农暇的时间，提倡改良手工业。”从1940年冬开始，他“拿了他薪金的一部分买了些羊毛，教导边民妇女纺毛线织毛衣的技术”<sup>22</sup>。为推广这一技术，西区于1943年在扎谷脑开办妇女纺织训练班，让当地妇女“学习以简单纺车代替纺锤，并以新法编织毛衣等，由孙俊英女士主持其事”。“先后受训妇女三十余人”，受训妇女将纺织技术带回“各寨推广”<sup>23</sup>。纺织训练班的工作后来发展成为在川西区很有影响的“家庭纺毛运动”。1941年春，耿笃斋到成都汇报工作时“曾将边民的成绩带来展览，很受社会欢迎。”<sup>24</sup>

佳山寨和日尔觉寨小学也设有妇女纺织习艺所，由两校老师讲授，培养边地妇女纺织技能。日尔觉寨小学曾到杂谷脑妇女毛线习艺所领到纺线机五架，由教员张春艳教学生纺羊毛麻线，“成绩颇佳”。此项新的生产技能引起了边地妇女的新奇和兴趣，纷纷自动请求加入进来学习纺线<sup>25</sup>。

萝布寨在伍明乐、吴祖泰、王湘杰刚开始工作时，也十分注重妇女手工技能的提高。在三人的努力下，萝布寨服务站于1945年开办有妇女手工练习班，训练边地妇女缝纫和编毛线等手工技能。边地妇女对于此项手工“都感觉兴趣”，练习班刚开办不久“就有六位大姑娘围着吴太太（王湘杰），跟她学结纽子”，并不断地“有女孩子来学编袜子”。而按照三人“对萝布寨工作的意见和展望”，他们不仅要尽可能地教授边地妇女“编织袋子和各款各式的羊毛衣服”，而且打算在她们“运用手指头工作的时候”，“传授给她们那暂定的宣教纲领和认字”<sup>26</sup>。

西康区的妇女生计服务也颇有成效。为“改进凉山区农牧事业”，西康区除大力开办农场外，与川西区一样，也“开办毛棉纺织妇女训练班”<sup>27</sup>，以提高边地妇女的生产技能。

以昭觉服务处为例。该服务处工作由李士达主持。李士达曾在1946年2月“利用春节召开夷人领袖大会”。他对少数民族首领表示，边部开展的生计工作就是要改变其生活的困苦状况。为让边民更容易理解他所说的话，他作了个简单的比较：“人家吃的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你们只有荞麦、洋芋、圆根、酸菜；人家住的是宽阔的房舍，你们只有低矮的黑屋；人家穿的是呢绒绸布，你们只有麻布毛毡；人家出门骑马坐车，你们只有赤脚跑路。你们的生活，实在太苦，应该快快改进。”怎样改进呢？李士达认为，边部所能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边地妇女“用机器纺毛织布，穿好的衣服，将来这计划改良你们的羊毛品种，使羊子多产毛，增加你们的衣料”，为此，他主张“开设毛纺训练班”<sup>28</sup>。

为让边民能够“穿好的衣服”，李士达多次给总部写信，积极呼吁总部重视“训练夷人妇女，更盼望毛织机早日运来”，早日“开办毛棉纺织妇女训练班”<sup>29</sup>。这项工作最终得到落实，妇女毛棉纺织训练班使众多边地妇女受到职业训练，提高了西康区妇女的生产技能。

### 三、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宗教事工

边疆服务部的福音传播工作是与社会、教育、卫生、生计等社会服务工作同步进行的。对边地妇女传教授道，是边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福音思潮兴起，但对社会工作目的性的认识仍然有着强烈的传统意味。1945年圣诞节前，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给边部写信提了几点意见，被边部赞为“最好的礼物”并公诸于杂志上。其中一条意见是：“各区工作应多注重宗教工作，虽然生计，医药，教育都重要，可是我们能得到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是增加了我们一份生力军，比方医生医好了十个病人，有的不过道谢一声，或捐点款，不见得就能真正了解本部，若是能得到一个真正教友，便是与本部发生实际关系。”<sup>30</sup>由此可见边部对传教工作的重视。基于这一认识，边部同工努力开展布道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川西区为例。前已述及，耿笃斋于1940年春前往川西区杂谷脑主持宗教工作。耿笃斋是一位典型的宣教士，对于“为道作证”极其迫切。初到杂谷脑即开始作“茶社布道”，每日携带各种书报到茶社陈列；并随时与茶客摆谈“真道”，“每晚在营盘街布道堂中召集夷人聚

会,为之讲解圣经,并教以唱诗祈祷。<sup>33</sup>除布道工作外,他还积极成立查经班、妇女会、纺织传习班等。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二年,耿牧师“即努力重建营盘街的礼拜堂”,打算在此“创办一处妇女圣经学校”。<sup>34</sup>耿笃斋的前期努力,为以后边地妇女布道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跟随丈夫崔毓珊到杂谷脑作布道工作的李美英也十分投入,她表示非常“喜欢这工作”,认为是上帝感召她到中国来从事福音传播的。李美英以杂谷脑创办的民众夜校为基础,对边地妇女进行宗教宣传。在她的努力下,布道工作“进行很顺利”,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女生在星期日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去作礼拜。”<sup>35</sup>

西康服务区同样重视对边地妇女开展福音传播。1942年5月底,“总会特派之布道员冯葆光牧师”携眷至西昌,负责西昌的布道工作。6月,冯葆光将西昌仓街福音堂收回。“然礼拜堂已破坏不堪,器具荡然一空,浸礼会之旧教友,多已星散死亡,所余无几。”冯葆光于是“寻找亡羊补牢并重建基础”。在给总部的《西康区部1942年秋季宗教工作报告》中,他希望在“各部中同工亦努力祷告切实合作以建设宁属之边疆教会”的基础上,“切愿每个家庭都基督化,及全家归主”。为此,服务区开展了“家庭礼拜”,“每礼拜五午后五时,往各教友慕道友家庭中轮流礼拜,籍此机会作向外布道工作。”在冯的努力下,家庭礼拜活动很快开展起来,“每次集会人数,妇女儿童约有廿余人。”为推进妇女布道工作,冯葆光还成立了“妇女团契会”,“每星期二上午午后五时集会一次。内容有崇拜、查经、识字、卫生、演讲、学诗等项。”加入妇女团契会的妇女有十余人<sup>36</sup>。

昭觉服务处在1946年年度工作计划中,曾提出成立“由女布道员主持”的“妇女慕道班”,“以夷村为单位,携带诗歌及宗教书片,教夷人妇女学习唱歌并讲述宗教故事,籍以推行妇女教育”。昭觉服务处一般是登门对妇女班布道,“顺带推行卫生教育”,其工作的细致认真可见一斑<sup>37</sup>。为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边部于1946年7月在西昌成立“西昌青年团契”。开办“妇女查经班”,“各界女道友以及团员之属眷均可参加”。为办好查经班,吸引更多妇女加入,西康区部专门设立有“妇女股长”职务,由女执事刘素原担任,负责召集妇女儿童事工会议。<sup>38</sup>西康区还规定每月终举行一次“妇女晚会”,

“籍以商讨妇女儿童工作”<sup>39</sup>。

由于工作细致认真,西康区在吸引信众和发展教徒方面,成绩突出。据方国渝旅行裸黑山的沿途观察,基督教堂已被当地人士认为是“绝大威权”。在小拉巴寨,除头目一家不入教外,“民悉教徒”。“每星期日,全寨教民礼拜三次,妇女单独举行一次”。鉴于当地有语言无文字的状况,在传播基督教义时,边部同工创造性的以罗马字母拼写裸黑语言,创造了一种裸黑文字,教边民读《圣经》。方国渝就曾惊讶地看见过这种以罗马字母拼写的裸黑文字《圣经》<sup>40</sup>。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力。

#### 四、边部妇女工作的困难与社会效果

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尴尬和困难。李安宅曾指出,边疆社会工作的困难表现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其内在困难,“一因边地物质条件不够,一因边民了解程度不高”;其外在困难,“乃在于边疆工作本身条件以外者”<sup>41</sup>。

具体言之,边部妇女工作的困难首先是妇女布道员太少。川西区的耿笃斋牧师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最为深刻。他刚到川西区布道时,虽然常常“单人独马,爬山进寨,孤苦之味,饱尝无余,如遇困难,更感无力应付”,但他觉得这些并不是一般人传说之苦,边疆工作,亦不象一般人想象之难。作者眼前感到的最大苦难,不是个人在工作上,人力太单薄,而是“当地同胞男女间界限森严”,“因此更特别感到有女传道同工之必要”。由此他呼吁“不久的将来能多有几位同工来,共同工作,更望国内同道多为边疆服务工作代祷,使真光早得普照在这一带。”<sup>42</sup>

边胞疑忌是边部工作的又一障碍。边部工作人员在村寨巡回时,由于无本地人的介绍与引导,“纯系单人开垦工作”,往往引起边胞怀疑,“有的认为是调查民情者,有的认为是蓄意卜居藉资营生者,还有疑为是算命先生”<sup>43</sup>。经过相互接触,虽多数边民能逐渐了解其工作的意义,但也有少数边民,“不免表现烦厌之感”,对服务人员的询问“或淡漠以应付,或敷衍以塞责”,有的甚或还以为是边部来募捐的<sup>44</sup>。有的边民对服务人员虽好,但他们内心总抱着怀疑,任凭边部人员如何解释,都“除不尽他们的疑心”<sup>45</sup>,让服务人员非常尴尬。尽管服务人员努力

期望边民改变其疑惧心理，效果始终不甚显著。

边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边部人员时常遇到的难题。川西一带，有的地方“虽在夏天，也可能冰天雪地，人迹罕到的山里羊肠小道有时宽不盈尺，而旁边就是无底深渊”<sup>47</sup>；而西康区则是“观其自然环境，世外桃源，察其实际生活，人间地狱”<sup>48</sup>，在这里工作，服务人员“住则仅避风雨，食则玉麦洋芋，行则惟有两腿，见闻限于一山，来往只有边胞”<sup>49</sup>，各服务区“由于边地环境特殊，生活交通种种不便，妇女工作发动较慢”<sup>50</sup>，后来虽有女同工在边地工作，但与其他工作比较起来，妇女事工显得缓慢。

此外，还应该看到，边疆服务是一项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及边地民众在内的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不是单凭教会的力量就能实现的。从单纯教会的角度看，边部的宗旨也很难完全实现。由于能够从事有效服务工作的人才太少，实际参与的边部工作人员更迭频繁，服务工作的连续性必然受到影响。

边疆服务的最大动力在于抗战激发的热情。正如当事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服务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sup>51</sup>。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二中全会第19次大会就边疆问题虽通过一个议案，但其参政会“对于边疆问题——边民的落后，边政的腐败——几乎没有谈及”<sup>52</sup>。政府对待边疆事务的这种态度，直接限制了边部工作的发展，致使抗战胜利之后，边疆服务工作不但没有如教会所期望的因对日战争的胜利而呈现“汹涌澎湃的（发展）趋势，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sup>53</sup>。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边部同工的社会改造工作及传教活动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边地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首先，边部所从事的服务工作极大地改变了边地妇女儿童受教育的状况。川西区和西康宁属地区在边部人员进入之前，“没有正式教育……小孩要认字，唯一办法即是当喇嘛，不然便没有认字的机会”。至于“国民教育”，当地人“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sup>54</sup>。根据此种状况，边部将各工作据点作为教育中心，拟定具体教育计划，“逐步实施”；在此基础上，还将包括妇女教育在内的“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同时举办”，希望能达到“提高边民文化，化除民族隔膜，灌输国家意义”的目的<sup>55</sup>。通过形式多种多样的

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包括广大妇女儿童在内的边胞教育状况<sup>56</sup>。有学者在评价边疆服务部在阿坝州开办近代教育的成就时分析道：“在当地的办学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相当不容易，开创了阿坝州藏族羌族新式教育的先河。”<sup>57</sup>这一评价如果用于其它服务区，也应当大体适合。

其次，边疆服务极大地改善了边地妇女、儿童的健康及医疗卫生状况，降低了川西区婴儿死亡率。边部初去边疆时，川西区新生婴儿死亡率很高，约占60%。考其根源，多数由于剪脐带用的是没经过消毒的锈剪，婴儿由此受到感染而患破伤风症而致。自边部在服务区创设医院后，“类此劣根性风气得到了很大纠正”，虽“妊妇以礼教束缚”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最初到医院请求医生接生者，为数并不太多，但许多边胞因服务人员的宣传，“已渐次明了”破伤风症的缘由。后来到医院要消毒、要纱布及剪刀消毒，以备接生用者，“已大有人在”，“事虽未达尽善，亦足证明边胞心理的改变”，其用锈剪剪脐带之习俗和不相信西医的心理“已根本发生动摇”<sup>58</sup>。

复次，边疆服务加强了边地妇女与内地的社会联系，增强了相互了解。例如，1945年3月底，佳山寨小学生及妇女识字班学生在崔德润率领下参观成都。“留蓉十余日，备蒙各界热烈欢迎。”四川省政府主席张岳军“以佳山寨学生来蓉参观，在羌民历史上是一件创举”，特“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谈谈”。佳山寨学生还受到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四川教育厅长郭子杰、十六区专员王元晖等官员的接待，并与成都一些基督教学校，如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神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高琦中学等单位进行友好联谊<sup>59</sup>。在其他地区，边部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与交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综上所述，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边疆服务运动中针对边地妇女开展的社会改造与福音传播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边疆服务的历史事实表明，随着社会福音思潮的兴起，在华基督教会对于中国边地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已经成为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和平教授指出，边部“籍教育、医药及农牧等为媒介，从改变社区经济着手”的作法，是将“中国式的农村传教方式，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而加以扬弃”，“是对过去单纯传教方式的修正，也是实践本色化的必由之路。”<sup>60</sup>秦教授的评价，

是十分中肯的。

(责任编辑:查常平)

\*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 2004 年度青年基金课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编号:川教科 SB04-005) 的阶段性成果。

- ① 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 9 期,1945 年 2 月,第 9-11 页。
- ② 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北京:中国广播电视社,1999 年 4 月,第 545-546 页。
- ③ Chi-hsien Chang(张启贤),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1940-1941),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a. P. 89.
- ④ 边部从创办至抗战胜利,一直在成都办公。抗战胜利后,迁由重庆。1947 年 10 月再由重庆迁到南京,因“同工作区相距太远,和同工见面的机会太少,因此在上海总会的决定下”,于 1948 年 12 月下旬重返华西,仍设总办事处于成都。(参阅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编:《边疆服务》复刊第 1 期,1950 年 3 月,第 29 页。《边疆服务》和《边疆服务通讯》系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编辑及印行,以下不再注明。)
-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服务规程》,编号 U102-0-27。
- ⑥ 《威州医院迁新址》,《边疆服务通讯》,第 5 期,1946 年 2 月,第 9 页。
- ⑦ 《理县志》,理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年 9 月。另可参阅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 1992 年 11 月,第 438 页。
- ⑧ 《边疆妇女的福音》,《公报》第 14 卷第 1、2 期合刊,1942 年 2 月,第 17 页。
- ⑨ 《边疆服务部组织边疆妇女促进会》,《田家半月报》第 9 卷,第 5、6 期合刊,1942 年 2 月 1 日,第 11 页。
- ⑩ 《成立边疆妇女工作促进会》,《边疆服务》第 1 期,1943 年 4 月,第 21 页。
- ⑪ 冯云仙:《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边疆服务》第 15 期,1947 年 3 月,第 2-3 页。
- ⑫ 《编后的话》,《边疆服务》第 15 期,第 22 页。
- ⑬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 1951 至 1953 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 50,案卷号 436。
- ⑭、⑯、⑰ 王贯三:《边疆服务部川西区一九四九年工作报告》,《边疆服务》复刊第 1 期,第 23、24、21 页。
- ⑱ 刘国土:《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边疆服务》第 20 期,1937 年 8 月,第 7 页。
- ⑲ 《边部(1940 年)五六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649-336。
- ⑳ 《边部(1940 年)五六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649-336。
- ㉑ 《吴祖泰尤喜交集》,《边疆服务通讯》第 6 期,1946 年 4 月,第 10 页。
- ㉒ 《谭秉玺现身说法》,《边疆服务通讯》第 4 期,1945 年 11 月,第 13 页。
- ㉓ 《西康区三一新村服务处工作简报》,《边疆服务》复刊第 2 期,1950 年 5 月,第 21 页。
- ㉔ 《杂谷脑定期检讨工作》,《边疆服务通讯》第 8 期,1946 年 8 月,第 2 页。
- ㉕ 王端若等:《惠康儿童站素描》,《边疆服务》第 24 期,1948 年 5、6 月份,第 12 页。
- ㉖ 张宗南:《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边疆服务》第 1 期,第 6 页。
- ㉗⑳㉙ 张伯怀:《耿笃斋牧师传略》,《公报》第 14 卷第 7、8、9 期合刊(出版日期不详),第 9-10 页。
- ㉚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 1951 至 1953 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 50,案卷号 436。
- ㉛ 《日尔党寨学生习纺线》,《边疆服务》第 2 期,第 23 页。
- ㉜ 伍明乐等:《我们对罗布工作的意见和展望》,《边疆服务》第 9 期,1945 年 10 月,第 19 页。
- ㉝ 《李士达同工来信》,《边疆服务》复刊第 2 期,第 29 页。
- ㉞ 《李士达春节演讲》,《边疆服务通讯》第 6 期,第 14 页。
- ㉟ 《昭觉服务处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边疆服务》第 10 期,第 28 页。
- ㊱ 《圣诞节好礼物》,《边疆服务通讯》第 5 期,1946 年 2 月。
- ㊲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第五届总会议录》,编号 U102-0-16。
- ㊳ 《李美英同工来信》,《边疆服务通讯》第 8 期,第 9 页。
- ㊴ 冯葆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西康区部 1942 年秋季宗教工作报告》,《公报》第 14 卷第 7、8、9、10 期,第 35-36 页。
- ㊵ 《昭觉服务处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边疆服务》第 10 期,第 30 页。
- ㊶ 《西昌青年团契动态》,《边疆服务》第 26 期,1948 年 9、10 月,第 20 页。
- ㊷ 吴景:《西康区西昌宗教工作动态》,《边疆服务》第 27 期,1948 年 11、12 月,第 11 页。
- ㊸ 《裸黑山旅行记》,《边疆服务》第 17 期,1947 年 5 月,第 5 页。
- ㊹ 参阅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社会部研究室编,中华书局 1944 年。
- ㊺ 耿笃斋:《边疆服务通讯》,《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14 期,1940 年 7 月,第 9 页。
- ㊻ 《边民宣教近况》,《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 U102-0-27。
- ㊼ 龙启惠、王端若:《我们与惠康儿童福利站》,《边疆服务》第 23 期,1948 年 3、4 月,第 15 页。
- ㊽ 《吴祖泰苦尽甘来》,《边疆服务通讯》第 9 期,1946 年 10 月,第 25 页。
- ㊾ 《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第五届总会议录》,第 160 页,编号 U102-0-16。
- ㊿ 《李士达复毛士洵先生书》,《边疆服务通讯》第 9 期,第 28 页。
- ① 《举目向山观看》,《边疆服务通讯》第 7 期,1946 年 6 月,第 1 页。
- ② 张宗南:《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边疆服务》第 1 期,第 4 页。
- ③④ 李安宅:《胜利与边疆工作》,《边疆服务》第 10 期,第 1、2 页。
- ⑤ 《边务要闻》,《边疆服务》第 10 期,第 37-38 页。
- ⑥ 于式玉:《黑水教育》,《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563 页。
- ⑦ 刘龄九:《关于工作检讨的几点概括意见》,《边疆服务》第 4 期,第 22-23 页。
- ⑧ 《幻灯教育到处受欢迎》,《参加茂县运动会及展览会》,《边疆服务》第 4 期,第 24 页。
- ⑨⑩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 74、86-87 页。
- ⑪ 侯慕渔:《理番协立医院事工概要》,《边疆服务》第 2 期,第 10 页。
- ⑫ 《佳山寨学生锦城观光》,《边疆服务通讯》第 2 期,1945 年 5 月,第 4 页。